

古典小说

新探



王齐洲

浙江古籍出版社



序

“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陆机《文赋》

中国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学评论是一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其中的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部分尤其蕴藏着许多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艺术珍品。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我国研究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的风气日浓，已出现了千帆竞发，百舸争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现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呈献给读者的这本《古典小说新探》就是青年研究家王齐洲同志十多年来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初步”者，不止于此之谓也。齐洲同志正当盛年，相信他一定不会以这些论文为满足，划地自限，而是会继续精进不懈，不断地创造新的成果的。

我之所以称齐洲同志为青年研究家，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之中，他总是那样富有朝气。他被评为副教授时，年方 35 岁；而晋升为教授时，也刚步入不惑之年。大家知道，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老教师多，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不少，可谓人才济济，因此，在评高级职称时，竞争总是特别激烈。而齐洲同志并未经过大学本科阶段，他是全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

有影响的科研成果通过一次又一次“评审关”的。这也可以说明他的这些论文的质量是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有关专家的认可的。

这本论集汇集了齐洲同志自 80 年代以来所发表的关于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的论文 22 篇。由于齐洲同志 70 年代末曾来湖北大学（当时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元明清文学，80 年代以来又经常和我一道从事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的学术活动，我对他在学术上的成长过程比较熟悉，所以在这本论集出版之前，他特要我为它写一序言。

这些论文在初发表时，我大都看过。有的是齐洲同志寄给我的；有的是我自己从报刊上看到的；有的引起了读者争论的文章，如《〈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还是我签发的；有的文章我签发后，又参与了对该文的评奖的审议，如《〈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吗》（该文曾于全国《水浒》学会成立大会上获《水浒》优秀论文奖）。因此，今天我重读这些论文时，觉得如睹故人，非常亲切；也为它们能够汇到一起出版感到十分欣慰！因为通过这本书可以使读者和老一代的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家由此看出一位青年研究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学术领域脱颖而出的过程，看出他成长的轨迹和发展的前景。还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通过本书看出我国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今后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的大趋势。这可以说是我乐于写这篇序的原因。

然而，当我濡墨着笔之时，又不免踌躇起来。我考虑到为齐洲同志的这本著作写序不同于给一般的作者的著作写序。因为在今天，也还有像齐洲同志这样立志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年青人，他们尤其想了解像齐洲同志这样不靠大学文凭，全凭个人

十多年的努力奋斗就登上了大学教授的台阶的年青人的经历，相信其中必定有可资借鉴之处。为此，特根据我的了解，谈一点个人的观感。

我以为齐洲同志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这样的造诣，首先是由于他具备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良好的素质。他对学术的执著与专心，即使在他担任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期间也没放松；他好学敏求，使他具有了较宽的知识面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他刻苦勤奋，所以总是比别人先行一步；注重实学不图虚名，使他得以潜心研究，摆脱了许多人为的束缚与羁绊。他的成功，应该说主要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

然而，客观条件对他的支持也不能忽视。窃以为应该把十四年来的改革开放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特别是党和政府制订的加快培养新生力量的政策看做是推进齐洲同志成长的巨大动力。齐洲同志所在的学校领导正是根据这一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派遣他到武汉进修，在他晋升副教授以后又支持、推荐他去北京访学，还支持他多次参加省内外的学术活动等，促进他在学术上扩大视野，增强他和外界的双向交流，激发他的文思，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他较快地在古典文学界显露头角。这就应了韩退之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名言。因此，应把齐洲同志的成功，作为一个范例，促使一些学校领导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自警。要像武汉一位老教育家的一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把精心培育“学林郁郁成才树，杏圃菁菁硕果浓”的“桃李园”作为自己的最大乐事。

下面再就本书的主要内容，略抒所见。

本书的文章中有八篇是论《水浒》和作为《水浒》中的主人公宋江的历史原型的，有三篇是论金圣叹的《水浒》评论的，这两者共十一篇——达到全书篇数之半。其他关于论古典小说

的文化意识、审美理想与明代小说发展线索诸文，也大都与《水浒》和金圣叹有一定的关系。而此外谈诸葛亮形象和《西游记》的总共不过四篇。由此可见，在本书中古典小说研究的重点在《水浒》，古代小说理论家的研究重点是金圣叹。窃以为对本书中这两类文章应联系从70年代末兴起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热来考察。

1992年11月，我在第六届全国《水浒》讨论会开幕词中曾指出：

由于我们提倡把对《水浒》本身的探讨和对《水浒》评论家李卓吾、金圣叹的评价当作一个系统的问题来研究，所以我们“一身二任”，既要研究《水浒》的流传演变史，它的思想内容，艺术价值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要研究李卓吾、金圣叹特别是金圣叹的文学理论遗产及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会同仁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的内容，而且拓展了它的领域，并使“为金圣叹翻案”这个历来认为不能接受的观点，基本上成为全国文学评论家的共识，从而大大促进了《水浒》研究的深入。也正是由于金圣叹得到“平反”，才使整个评点派结束了五四以来被指目为“八股文法”而受到歧视的处境，并且在我国形成了重视小说理论研究的风尚，从而也促进了《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研究。这些都可以说明：应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十余年来的《水浒》研究，它的巨大成就是不应否认的。

显然，这样巨大的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全国《水浒》研究家的共同努力。我认为齐洲同志也为这一学术热点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并在这样频繁的热烈的学术活动中锻炼成长。

由于《水浒》研究中分歧的意见较多，就本书各文而论，有

与我的看法一致者，也有不尽一致者，甚至还有彼此矛盾者，但这乃是正常现象。我十分欣赏儒家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治学态度。我认为先秦儒家后来分成了八派，正是这个学派有生命力的表现。我曾在为一位同志的论《水浒》的著述写的前言中写道：

本来为学术著作写序是一件难事，而为《水浒》论著写序尤其不易，因为《水浒》现在还是处在一潭浑水、一场混战之中，它并没有一套判断各人是非的程式，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写序的人和作书的人的意见不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写序的人如果对作者与自己相同的意见大加赞美，这是阿其所好；如果对不同的意见加以非议，这是强人从己。

我之所以不便轻下判断的原因正由于此。好在本书中的文章都已发表过，而且齐洲同志行文观点显明，举证详悉，且逻辑严密，语言流畅，他的论点的是非，读者读后自明，无须我在此说明。

我要说的是齐洲同志研究古典小说力图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见，而主张从文化角度评论小说作者的心态，这个努力的方向是比较新的，是有广阔的研究前景的。当然兹事体大，还需要作更深入的探讨和艰苦的努力。

齐洲同志提出《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也不是农民起义。这个观点我虽然不赞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妨继续争论下去。

有的问题经过多年的争论，已经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该为读者接受而不必别生异议。我指的是关于金圣叹《水浒》评论应居我国小说理论史的高峰的评价问题已基本论定。但应该看到，齐洲同志赞扬圣叹之说早发表于1981年10月，此

时为圣叹翻案之说在我国才冒出地平线，围攻者大有人在，而齐洲同志却能旗帜鲜明地发表这样的文章，这说明他对新事物的敏感性，正体现了一位青年研究家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学术勇气和不拘守陈说的理论特色。

齐洲同志研究古典文学注意文史结合，常常能够钩稽文献中的资料作证，使自己的论点具有说服力。他不喜滥用新名词、新术语，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论，这种朴素踏实的学风也是值得提倡的。

总之，我认为这本书既是齐洲同志十余年来治古典小说的总结，也是有不少优点和特色的一本学术论集，我为它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望作者百尺竿头，锐进不已！

湖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所长
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

张国光

1993年3月

目 录

序	张国光(1)
---------	--------

综合篇

中国小说起源探迹	(1)
中国古小说概念的发生与演变	(23)
强化古典小说研究的文化意识	
——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反思	(36)
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	
——明代小说发展的一条线索	(48)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阶级意识	
——从《水浒传》取材谈起	(69)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理想	(85)

作品篇

论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	(10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不是农民起义	(113)
《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	(126)
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	(147)
谈卢俊义的上梁山	(164)
李师师形象的塑造与《水浒传》的创作思想	(177)
《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吗	(189)
明代对《水浒》的推崇与禁毁	(198)

孙悟空与神魔世界	(208)
孙悟空与唐僧	(225)
《西游记》与宋明理学	(239)
理论篇	
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	(254)
论“动心说”	
——金圣叹小说理论再探	(272)
金圣叹论小说结构	(284)
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296)
平意求索 与之批评	
——试论鲁迅研究《水浒》的方法	(313)
后记	(323)

中国小说起源探迹

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但不解决这一问题，就无法确定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及其对象。为了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发展，笔者不揣谫陋，爰作小说起源探迹，以为引玉之砖。

—

在我国，最早谈到小说起源问题的是汉代学者，而以张衡之说最为明确肯定。《文选》卷二载《西京赋》云：“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其中“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便是直接回答小说的起源问题。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虞初”，据李善注称：“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云：“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史记·封禅书》载云：“（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可证班、李所注不诬。《西京赋》所谓“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即是说小说之体创始于武帝时方士，虞初不过为方士之代表而已。

为什么小说兴于武帝时方士，张衡作了明确回答。“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云：“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这种说法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后汉书·方术传》小序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屈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策，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汉武帝嗜好方术，迷信鬼神，《史记·封禅书》中有详细记载。如他“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客礼齐人方士少翁，并拜为文成将军；拜方士栾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佩四印”，封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甚至不以臣相待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方士们所以能取得武帝信任，固然主要是利用了他的迷恋富贵、贪生怕死的心理，什么黄白之术，什么不死之药，什么海上仙山，当然都是骗局。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方士掌握了诸如医药、天文、航海、建筑、民俗、博物等较为专门化的知识。如武帝所宠信的李少君便能一眼认出齐桓公用过铜器；齐人少翁能让武帝于帷幕中重见王夫人（《汉书》作李夫人）的形容；济南人公玉带献给武帝的“黄帝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覆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有些方术实际上可代表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如《后汉书》将华佗入“方术传”，而“方术传序”称“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并不全是夸饰。方士源出于古巫，然而汉代的方士早已不限于古代巫术的鼓舞祠醮之类。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他们除了“定祸福，决

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后汉书·方术传序》），即以神其术来取得人们的信仰外，还必须掌握一些科学文化，了解一些朝廷典章制度，熟悉一些政治思想材料，懂得一些地理博物知识，以备皇帝顾问，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可以想见，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和谋取自身的富贵，当时“通于神明”的方术一定很多，单靠声口相传和单凭记忆来保存其方是困难的，于是就有了文字的记载。《史记·封禅书》载：“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士多更来言神事矣。”又载：“神君所言，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书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这些用文字记录的方术最初都秘不示人，它们是方士们干禄的资本，如“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所谓“匪惟玩好，乃有秘书，……从容之求，实俟实储”。然而，它既然受到皇帝的重视，定会遭来艳羡，如栾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这种现象便是《方术传》所说的“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王瑶先生在《小说与方术》一文中谈道：“无论方士或道士（方术后来发展为道教，方士也即成了道士——引者）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疑“任”之刊误），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中古文学史论集》）这话是很有见地的。武帝之后，这种方士小说在

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方士们常挟这些奇书秘籍以自重，必然刺激文人们染指的热情。特别是到了东汉初年，由于光武帝刘秀因讖言而起家（《后汉书·光武帝传》：“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人以图讖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轺等起于宛。”），故“尤信讖言”，这类奇书秘籍必然会被更多地创作出来并引起文人们的关注，《后汉书·方术传》所云“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便是指的这种情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从东汉起会有那么多学者谈论小说，甚至《汉志》把它列为一家的原因。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是符合汉代小说发展实际的。

从《汉志》著录来看，说小说起源于武帝时方士也是可信的。《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而《虞初周说》占作品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八以上；《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都出自武帝时方士之手；《臣寿周纪》七篇，《百家》一百三十九篇均成于武帝后，自然受到武帝时方士小说的影响；其余九家，班固明注依托者就有六家，很可能是武帝时或武帝后方士所作。即是说，《汉志》著录的小说中可断定为武帝及武帝后的作品占全部著录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仅《周考》、《青史子》、《宋子》三家，班固不注年代，或为近古。按《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称“考周事也”，今已一字无存；《青史子》五十七篇，班注“古史官纪事也”，然是书至隋便已亡佚，鲁迅曾从《大戴礼记》、《风俗通义》等书中辑得三篇，全为谈礼之短简，此二书“近史而悠谬”。《宋子》十八篇，班固引荀子语曰：“宋子，其言黄老意。”宋子即宋钘，或称宋轻，战国时宋国人，在齐为稷下学士，《孟子》、《庄子》、《荀子》等书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

宋针的思想近墨傍道而自成一家，在诸子之列。《汉志》收他入小说家，表明《宋子》不类《孟子》、《庄子》、《荀子》等思想理论著作，或许竟是一种依托，故“近子而浅薄”。从贾谊《新书·胎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保傅篇》，疑误。）曾引《青史氏之记》（《通志·氏族略》引贾执《姓氏英贤录》云：“晋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与《大戴礼记·保傅篇》所引《青史氏之记》一则略同来推论，《周考》、《青史子》、《宋子》三书中应该保留有先秦古籍。张衡去班固未远，也属博闻强识之士，必然见过此三书，如果它们确属先秦古籍，张衡定不会漠视其开拓者的地位。从《新书》、《大戴礼记》引文均不作《青史子》而称《青史氏之记》来看，《青史子》也应成书于贾谊之后。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张衡认为此三书成书与《虞初周说》时次相近，而《虞初周说》以其篇帙浩繁内容丰富足以代表这一时期小说的水平，故才断言“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的。换句话说，张衡认为《青史子》等书也当为武帝时方士所作，尽管这些作品由于方士们“从容之求”而保留了较为可信的古代典籍片断，但并不能改变它们“尚奇文、贵异数”即作为方士小说的性质。

《汉志》对小说家的著录虽然可以用来证明张衡的小说起源说，但由于小说观的不同，《汉志》对小说起源的看法与张衡却很不一致。《汉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亦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汉志》乃班固删取刘歆《七略》而成，这种小说观也许是刘歆的，不过刘歆既为班固所服膺，自亦可视为班固的意见。由于刘、班二人受“学必出于王官”的正统思想的束缚，所以他们论各家各

派的产生不是从它们各自的时代去寻找根据，而是想方设法与周官攀缘比附，他们所说的小说家所从出之稗官便是这种附会的一个“杰作”。由于此官不甚显于先秦典籍，致使历代学者耗费精力，近两千年不得确解。近人余嘉锡细绎经传，详加考辨，以为“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古者庶人不得进言于君，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士仅得以传民之语达之于天子，士所传民语便谓之小说（见《余嘉锡论学杂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余氏之论翔实周密，足可信从。如果我们承认此说不诬，那么，《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其对小说作品的著录便出现了矛盾。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可见秉笔记录的责任在史（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士只有传达庶人谤誉之言的任务。《汉志》如淳注云：“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正是这个意思。既然士只有口头传言，并没有形诸文字的著述，那就无论这传言多么生动形象，也不能算做小说，因为小说的一个起码要求便是可供阅读。如果这一条也可不计，那么小说的起源就该追溯到人类社会生活开始的时候，即如鲁迅所说：“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辛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讲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样，稗官传言同样不能看做是小说的起源。然而，仅仅从一般意义上，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方面来谈论小说的起源是不够的，它不能给我们认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以更多的帮助。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小说的起源是限定在作为文字作品的小说的最初出现这一特殊意义上的，不然我们很难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张衡正是从“乃有秘书”的角度来谈论小说

起源的，故信而有据，而《汉志》离开了这一点谈起源，就难免使人不敢据信了。去班固未远的荀悦在其所著《汉纪》中叙诸子十家之所从出，九家全同《汉志》，独于小说家删去“稗官”一语而接以“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可见当时人对“稗官”之说已存怀疑；《隋书·经籍志》则干脆将“稗官”换做有案可稽的周官“诵训”和“训方氏”，更证明这种溯源纯属附会。事实上，《汉志》并未著录一部稗官所撰小说作品，倒是切实证明当时所见绝大多数作品为武帝时方士所作。这种作品著录与理论概括的矛盾，反映出刘、班这些正统史学家的保守思想与社会存在的矛盾。而在逻辑上，《汉志》也是混乱的，如鲁迅所说：“《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造也。”（《中国小说史略》）其实，《汉志》所谈各家之所从出，不仅小说家出于稗官之说不可信从，其他各家也多不可为据，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等等，也纯是一种穿凿。我们今天讨论各家学说的起源，自然不能依从《汉志》，讨论儒家只能从孔丘开始，讨论道家只能从老、庄开始，讨论墨家只能从墨翟开始。后人把小说家称为稗官家，把小说唤做稗官野史或稗官家言，显然是受了《汉志》的诳惑而造成的思想混乱，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小说真的从所谓稗官开始，那便无异于缘木求鱼了。因此，不打破对《汉志》的迷信，我们就不能前进。

《汉志》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之不可信从已如上述，由于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它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的论述同样牵强含混，不能反映出它所著录的小说作品的实际。如果把《汉志》的小说观与桓谭《新论》的小说观作番比较，这一点也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桓子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

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早于班固而与刘歆同时，学术界一般认为《新论》的小说观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拙见以为不然。虽然，桓谭与刘歆交往颇密，谈学论道，必致互有影响，而班固曾受肃宗（汉章帝）之诏补续桓谭所著《琴道》，也当熟悉《新论》（因《琴道》为《新论》之一篇），但是，桓谭的“非毁俗儒”、“非圣无法”与刘、班的崇儒重道显不相侔，他著述中“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词，莫不证定”（王充《论衡·超奇》）的求实态度，与刘、班的恪守祖训、承祧正统的写作宗旨亦不契合。表现在小说观上，《新论》重实际而不穿凿，《汉志》却重统绪并多臆测。《汉志》所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强调小说反映的是百姓的谤誉，即所谓“刍蕘狂夫之议”，无非要坐实稗官之说；它所著录的作品却大抵不是什么“刍蕘狂夫之议”，如“封禅”只是皇帝之事而与百姓无与，“未央术”显然不适用于民间，“考周事”、“古史官纪事”都与百姓无涉。至于小说的形式特点，《汉志》并无说明，我们至多只能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想到它的琐屑，从“缀而不忘”想到收集整理而已。倒是《新论》之说明晰畅达。人们常常把《新论》的“丛残小语”与《汉志》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看做同义语，其实不完全如此。《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桓谭《新论》曰：“‘扬子云才智闻达，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也。’国师子骏（即刘歆——引者）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贵所闻贱所见，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此“丛残小论”是指那些立意不高又未形成体系的零碎著述。“丛残小语”与“丛残小论”意为接近，当指那些无关宏旨又漫无中心的片